

纪宗安 著

西辽

史论·

耶律

大石

研究

新疆人民出版社



西辽史论·耶律大石研究

纪宗安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西辽史论·耶律大石研究

吉宗安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政编码830001)

新疆乌鲁木齐市陆军学校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6.375印张 5插页 150千字

1996年8月第一版 199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7-228-03990-4/K·450 定价:25.00元

0005385

前 言

西辽,又称喀喇契丹,是历史上契丹族建立的中国北方辽朝在12世纪30年代被金朝击败之后,由耶律大石率领的西迁一支在中亚地区创建的强大王朝。它疆域广阔,部属众多,历时近90年,在中外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西辽,是辽王朝在新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条件下的继续,是中国历史上极富特色的一个环节。它对广泛传播当时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沟通东西方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强东西方人民的相互接触和了解,促进中亚各民族的融合与形成等,起了积极的作用,给源远流长的中西关系史增添了新的篇章。它维护了中亚地区半个多世纪的基本和平与安定,促进了中亚地区社会经济持续地向前发展。

西辽王朝的创建者耶律大石,具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他思维敏捷,言辞锋利,眼光阔大,判断准确,指挥若定,气度恢宏,善于鼓动,恩威服众,遇胜图远,临危不惧,是我国历史上足以和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人齐名的少数民族杰出人物,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当然,和历史上许多封建王朝创业者一样,他也具有枭雄的一面。

对这位在中外历史上叱咤风云,留下了不朽业绩的

人物，国内外学者已做过一些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其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忽视的。但由于西辽历史的特殊性，有关耶律大石和西辽史还存有许多分歧和模糊不清的地方，而研究耶律大石的专著至今也未见面世，这大概是社会上许多人对耶律大石还感到相当生疏的主要原因。

本书旨在沿着前人的研究足迹，充分地利用国内外（特别是前苏联在中亚地区的考古材料等）新近的研究成果，对耶律大石和西辽前期在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举措得失做一系统的阐述和评价，以图赋予耶律大石这个历史人物应有的地位。

笔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时曾钻研过西辽问题，最近又重拾旧题，发现对许多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阅历的增长，大概是其中的主要原因。我想，社会是在不断变化，人也会不断进步，所以学问是不会有穷尽的。再过若干年回头看看，本书依然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所以我在此谨向学界的前辈和同仁恳请赐教。

作者

1993年5月8日于广州暨南园有容斋

目 录

前 言	(1)
一、耶律大石与辽的西迁	(1)
(一) 内外交困的天祚朝国势	(1)
(二) 耶律大石的早期活动	(7)
(三) 西迁决策的逐渐形成	(13)
二、建立西辽帝国	(24)
(一) 可敦城休养生息与称帝	(24)
(二) 西迁叶密立	(33)
(三) 建都巴拉沙衖	(40)
(四) 忽毡战役和卡特万战役	(46)
(五) 臣服花剌子模,完成帝国大业	(51)
三、耶律大石治国	(63)
(一) 中央与地方官制	(63)
(二) 基本国策和统治特点	(70)
(三) 西辽国家的军事	(75)
四、西辽帝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	(89)
(一) 土地占有形式和农业生产	(91)
(二) 蓬勃发展的手工业	(96)
(三) 建筑业的新成就	(104)
(四) 商业贸易与城市的发展	(110)

(五) 宗教与文化	(119)
五、耶律大石及西辽在历史上的地位	(130)
(一) 耶律大石以后的西辽	(130)
(二) 耶律大石是中外历史上的杰出人物	(136)
(三) 西辽在中国史和中亚史上的地位	(141)
附录一 大事年表	(150)
附录二 参考文献	(162)
(一) 中文书目	(162)
(二) 论文目录	(166)
(三) 外文文献	(170)
附录三 耶律大石及西辽史的研究状况	(176)
附录四 有关耶律大石和西辽的基本史料	(183)
(一) 中文史料	(183)
(二) 穆斯林史料	(189)

一、耶律大石与辽的西迁

(一) 内外交困的天祚朝国势

契丹人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与奚人同为源出于鲜卑族宇文部的一支。唐末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各部，逐渐强大，于公元 907 年即可汗位，916 年称帝，是为太祖，国号契丹。947 年改国号为大辽，现统称辽朝。辽朝曾雄踞中国北方达 200 多年。其疆域辽阔，东起鸭绿江，西抵阿尔泰山，北到贝加尔湖，南至长城以南，今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它的四周邻国，有的受辽封，成为附庸国；有的则缴纳巨额“岁币”，来换取和平。有辽一代（包括辽朝和西辽）在中外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尤其是中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曾一度有赖辽人的活动，所以西方中世纪的许多民族均以契丹（中古英语拼为 Cathay）称呼中国，阿拉伯语的 Khita 或 Khata 则专指北中国。而今斯拉夫语和希腊语还称中国为 Китай 或 Kitaia。

辽朝末代皇帝天祚于公元 1101 至 1125 年在位，但辽朝的败亡之势自道宗执政（公元 1055—1101 年）的后期已见端倪。正如《宋元通鉴》的作者王宗沐所说：“辽之亡也，吾不曰天祚，而曰道宗。……道宗初政，似有可观者，而晚年谗巧竞进，贼残骨肉，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

岁。”①“道宗用人不能自择，令各掷骰子，以彩胜者官。”②皇帝用人如此之荒唐，官吏们也大多贪赃枉法，放债经商，恣意役使管内人民。如久在相位的张孝杰就说：“无百万两黄金，不足为宰相家。”③清宁三年（公元1057年），虽“禁职官於部内假贷贸易”，大康九年（公元1083年）又“禁外官部内贷钱取息”④，却禁而不止，收效甚微。大康三年，南京道饥，而知三司使事韩操却以“钱谷增羨”得到晋升。朝廷更是不顾连年灾情，“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⑤

天祚即位，更以昏淫乘其弊，比道宗有过之而无不及。范仲熊的《北使记》曰：“天祚及即位，拒谏饰非，穷奢极欲，盘于游畋，信用谗谄，纪纲废弛，人情怨怨。故金人乘其弊而及之，所相辑克。十年之间，身擒国亡。”契丹故事，四时游猎，春山秋水，冬夏捺钵。⑥这成为皇室贵族们的一种奢靡的生活方式。而天祚尤其纵情畋猎，所至无不扰民。天庆三年（公元1113年），“猎狗牙山，大寒，猎人多死”。而天祚不仅不收敛，反而继续扩大围场，“徙大牢固山围场地居民于别土”⑦。属于后族的萧奉先，“见帝好猎，每言从禽之乐，以逢其志，天祚悦而从之”⑧。使这个“专尚谄谀，明结中人，互为党羽，球猎声色，日蛊上心”⑨的小人柄国垂20年。又如随驾内库都点检刘彦良，导引天祚为一切失德之事，国人呼之曰“肉柱杖”。另一方面，“知国将亡，前后谏甚切的辽臣阿息保”却“死其非罪”，“人尤惜之”⑩。另一位“厉声数上过恶，陈社稷危亡之本”的耶律术者也被杀⑪。于是，“千官侧目兮寂无声，……祸尽忠臣兮

罚不明。”^⑫

天祚帝在朝廷内斥逐忠良，任用宵小，势必造成“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蓄兮爪牙兵”^⑬的党争纷纭局面。本来辽之政权，自立国以来就为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二族把持，二姓之间屡演汗位之争，故有“李胡（耶律阿保机第三子）而下，宗王反侧，无代无之。辽之内难，与国始终”^⑭的评语。仅以耶律余睹叛裂事件为例：余睹，辽之宗室，天祚帝保大初年官统兵副都监，其妻为天祚文妃之妹。文妃所生晋王因贤能受国人爱戴，而天祚宠臣萧奉先的妹妹元妃生秦王，奉先兄妹恐秦王不得立，便使人诬告文妃、余睹等人谋立晋王，文妃等人被处死。当时耶律余睹身在军中，知其难辩真假，于是“引兵千余，并骨肉军帐，叛归女真”^⑮。天祚大怒，派四军太师萧干、北宰相萧德恭等人追拿。行至半途诸将却私下议论说：“萧奉先恃宠，蔑害官兵，余睹乃宗室雄才，素不肯为下，若擒之，则它日吾辈皆余睹矣，不如纵之。”^⑯于是众人还兵，谎称追袭不及。身为辽统治集团核心人物的耶律余睹，因为“灼见辽国事宜”，所以金人“自余睹降，益知辽人虚实矣”^⑰。“余睹既入女真，为其国先锋，引娄室、孛堇兵攻陷州郡，不测而至”^⑱，这无疑给辽带来极大损失，朝廷大震。“天祚怒国人叛己，命汉儿遇契丹人则杀之。初，辽制，契丹人杀汉儿者皆不加刑，至是，见者必死，国中骇乱，皆莫为用。”^⑲《大金国志》上也有“乃令诸路尽杀契丹，诸路大乱，月余方止”的记载。

辽朝末年，既然昏君不恤政事，荒于游畋，沉湎声色，

统治集团内部又人心背离，四分五裂，对百姓势必就政繁赋重，淫刑吝赏，造成民罹涂炭。仅以西北诸部为例，“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纠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一遭寇掠，贫穷立至。春夏赈恤，吏多杂以糠粃，重以掊克。不过数月，又复告困”^②。剥削之重，由此可见一斑。在繁重的赋税盘剥下，农村形势急剧恶化。天庆八年（公元 1118 年），“时山前诸路大饥……，斗粟直数缗，民削榆皮食之，既而人相食”。为逃避沉重的赋税，户口隐漏现象日益严重。南京三司度支判官马人望“检括户口，未两旬而毕。知留守萧保先怪而问之，人望曰：‘民产若括之无遗，他日必长厚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③除去这些问题外，更为棘手的是人口流散。破产逃亡的农民脱离生产，游食他乡，而朝廷为了保证税收，实行封建王朝惯用的推逃之法，结果加速其他未逃亡农民的破产。

为数众多的隐户和逃户常常铤而走险，成为所谓的“盗贼”。史籍遍载这样的消息：天庆三年（公元 1113 年）“李弘为左道聚众为乱”；天庆七年二月，“涑水县贼董庞儿聚众万余，破之”，三月，“复聚”；天庆八年春正月，“东路诸州贼烽起，掠民以充食”；夏五月，“安生儿、张高儿，聚众二十万作乱”；同年夏六月，“贼霍六格陷海北州，趣义州”^④。而被称为“巨贼”的赵钟哥甚至一度袭击皇室，劫走宫女和御物。另有天庆六年春正月，渤海人高永昌杀东京留守萧保先，自称大渤海皇帝，据辽东 50 余州的起义，“旬日之间，远近响应，有兵八千”^⑤，给辽廷以沉重打击。

辽之东京，本渤海故地，而萧保先严酷寡恩，人民苦不堪言，故有是变，起义者不受招安，坚持斗争。尽管这些大大小小的起义不久皆被镇压下去了，而天祚“益务绳以严酷，由是投崖、炮掷、钉割、脔杀之刑复兴焉。或有分尸五京，甚至取其心，以献祖庙”^④。可是继起者大有人在，“其众散为盗，所至掳掠，而辽不能制”^⑤。

就在辽末社会危机表面化的同时，女真人反抗契丹贵族统治的斗争，也与各地人民起义遥相呼应，蓬勃兴起。于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摧枯拉朽之势。女真反抗辽朝的斗争绝非偶然，它是长期以来契丹贵族对女真人残酷剥削压迫的必然结果。有关这方面的史料，俯拾皆是。在此拣其重要者列举五点：

其一，女真之东北与五国^⑥为邻，五国东接大海，出俊鹰，名海东青。其中白爪的一种尤为珍贵，叫玉爪骏。其鹰“大仅如鹞，既纵，直上青冥，几不可见。俟天鹅至半空，俛自上而下，以爪攫其首，天鹅警鸣相持陨也”^⑦。契丹贵族们酷爱之。每岁大寒时发使向女真索取海东青，作为贡品。及天祚即位，贡贡尤苛。而女真本土不产海东青，必须与五国战斗之后方可得。女真人当然不胜其扰，极为厌恶。女真“因是起变，而契丹以亡”^⑧。

其二，《三朝北盟会编》记：天祚即位之后，寝用奢侈，宫内喜爱北珠。“北珠，美者大如弹子，小者如梧子，皆出辽东海叉中”。每年至十月采蚌取珠，而此时北方早已是坚冰厚达盈尺，取珠者必须凿冰入水捕蚌。结果，“人以为

病焉”。

其三，辽朝政府经常派出银牌天使到女真地方去，每餐在中下户处止宿，“必欲荐枕者，以未出适女待之”。有些索求海东青使者，自恃大国使命，“惟择美好妇人，不问其有夫及阀阅高者”，由此，“女真寝忿，遂叛”^⑧。

其四，天庆二年二月，天祚到混同江（今松花江）钓鱼，令周围千里以内的女真酋长皆来朝。在“鱼头宴”上，天祚借酒半酣，命诸酋长次第起舞，以供自己取乐。当时惟独完颜阿骨打固辞不能，“喻之再三，终不从”。事后，天祚想借口边事除掉这个不驯服的女真酋长，虽因受劝阻未下手，但这种傲慢的态度，侮辱人格的行径，不可能不在阿骨打及女真人心中留下仇恨的种子。半年之后，“阿骨打称兵，先并旁近部落”^⑨，次年即攻取了辽朝边境的宁江州。

其五，辽朝政府在东北边境设有与女真贸易的榷场。在朝廷的纵容下，东北边境的官吏和奸商对女真人民巧取豪夺，谓之“打女真”。如在宁江州榷场，女真以北珠、人参、生金、松实、白附子、蜜蜡、麻布之类为市，而“州人低其值，且拘辱之”^⑩。因是女真人的反抗怒火首先从宁江州（今哈尔滨市以南）燃起。

天庆四年秋七月，阿骨打召集女真诸部兵马攻宁江州。此时昏庸的天祚帝尚在庆州射鹿，对东北路统军司的报告，闻之“略不介意”。女真初起师只有千骑，用其500甲攻宁江州，辽军调集5万人马却御之不胜。败北之后，旋又增兵至20万，与女真3000在出河店激战，复败。次年

又有辽主天祚亲征的达鲁古战役和 70 万众参加的驼门之战，均以辽军失败告终。辽朝政治上的腐败，人民的穷困，已从根本上摧毁了辽军的士气和纪律。在斗志旺盛的女真人攻击下，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却不能使辽军免于溃败。宁江州失守后，溃散的辽军所至之处，到处抢掠，朝廷惟恐他们相聚为患，不予加罪，“于是诸军相谓曰：‘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故士无斗志，望风奔溃”^②。

宁江州一战，敲响了辽朝灭亡的丧钟。自此以后，面临金军的攻击，辽军各地守将一触即溃，纷纷叛降。正如耶律大石后来力谏时所描绘的：“自金人初陷长春、辽阳，则车驾不幸广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则都燕山；及陷中京，则幸云中；自云中而播迁夹山，……使举国汉地皆为金有。”^③就这样，短短的几年内，金兵一越三千里，直捣云中，天祚帝只好率残兵败将逃进夹山^④，成为名副其实的流亡天子了。

总括说来，辽朝在它最后的 11 年里，外有女真的进逼和宋朝的对峙，内有人民的起义和统治集团的分裂，的确是左支右梧，困蔽日甚了。

（二）耶律大石的早期活动

耶律大石，字重德，契丹人，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八世孙，生于辽道宗大安三年（公元 1087 年）^⑤。虽然他属于皇族，但距太祖甚远，即使有荫可袭也微不足道，只有靠

努力才能使社会地位不断上升,故而对于他的世系和青少年时的情况,史载阙如。《辽史》称他“通辽、汉文字,又善骑射”,看来他自幼受过很好的双重教育。天祚帝天庆五年(公元1115年),也是金太祖阿骨打称帝的这一年,29岁的耶律大石成为进士^⑧,继而殿试获翰林应奉。据辽制,殿试第一“特赠一官,授奉大夫,翰林应奉文字。第二、三人止授从事郎。”(《契丹国志》卷二十三)这相当于中了“状元”。不久,又升为翰林承旨。因为契丹语呼翰林为林牙,所以中外史籍里常称之为大石林牙,或林牙大石。大石是译音,所以汉文史籍中还见有达锡、达实、大实等称呼。

由于才华出众,刚刚踏上仕途的耶律大石就受到重用,很快(公元1117年以前,因为此年泰州失守)被派往前线地区的泰州(今内蒙古自治区白城一带)任刺史,后调任祥州(位于今长春市与哈尔滨市之间)刺史,继而迁升为辽兴军节度使(驻平州,今河北省卢龙县)^⑨。对大石这六、七年间的活动和业绩,史无记载。但我们可以看出,他一直处在对金作战的前沿。面对辽军一联串的败绩,他从中积累着正面和负面的作战经验。或许,他也在一些小型或局部战役中取得过胜利,否则无法解释他为何能被安放在辽兴军节度使的重要位置上。辽朝将其版图划分为东、西、南、上、中京五个道。公元1120年,辽已失去了东京道和上京道,其所属郡县失去几半。同年,宋朝遣使浮海与金朝订立同盟,议定夹攻辽朝。“及陷上京,则都燕山”,南京(燕京,今北京)眼看成为辽朝的最后据点。此时,南京道内又“贼盗烽起”,有被称为“滦贼”的安生儿、

张高儿，被称为“奴贼”的张撒八，还有霍六哥、补疏只（阻卜族）等人的起义，其众者“聚众二十万”^③。而南京道只分为东部的平州和西部的析津府两个行政区域，由此可知辽兴军节度使地位的重要。两年以后，南京道即成为辽朝为生存而最后作战的主要地区。

天祚保大二年（公元 1122 年），金兵大举南下，连取中、西、南三京。天祚领 5 000 骑^④，弃燕京，经鸳鸯泊（今张家口以北的安固里淖）、白水泊（今察哈尔右前旗的黄旗海），于三月逃入夹山。此后天祚数日无消息，燕京一片混乱。宰相李处温，四军大王萧干^⑤等引唐灵武故事^⑥，乘机拥立留守燕京的秦晋国王耶律淳^⑦。耶律大石不甘辽朝的覆亡，与多数南京留守诸将表示拥戴。于是“集蕃汉百官、诸军及父老万人诣淳府”。“淳方出，李奭（处温子）持赭袍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惊骇，再三辞，不得已而从之”。号天锡皇帝，改元建福，设置百官，颁布赦令，降封天祚为湘阴王^⑧，史称“北辽”。北辽的建立，无疑在辽朝国土上又树立起一面抗金保辽的旗帜。当时，天锡隶有燕、云、平、上京、中京、辽西六路。而沙漠以北，西南、西北两路招讨府，诸藩部落等仍隶属天祚。所以《大金国志》上有“辽朝自此分矣”之语。北辽是一个独立的地方政权，耶律大石又是其领导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官号太师。当时北辽的“军旅大事悉归大石”^⑨，而大石也不负众望，在北辽立国的 9 个月时间里，抵挡住了宋朝北上的劲敌，显示了超人的军事才能和外交才能。同时，他也在斗争实践中观察局势，积累经验，萌发了寻找根据地，保存实力，向西发展

的念头，为以后西迁计划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保大二年五月以后，辽宋边境发生了一系列的激战。四月，宋徽宗派太师童贯“勒兵十万巡边”，与金配合夹击辽军。五月下旬，种师道总东路五军进兵白沟，辛兴宗总西路五军趋范村，以图对屯守涿州新城县的耶律大石及萧干所率的辽军主力形成包围之势。五月二十六日，种师道裨将，前军统制杨可世与大石军在兰沟甸相遇，宋军“为大石林牙所掩，大败而还”。紧接着，淳帝增派3万余人，辽军度白沟，二十九日与种师道兵隔河对垒。杨可世先遣人持黄榜旗前去招抚。大石看罢，毁旗骂曰：“‘无多言，有死而已！’话未竟，矢石如雨。”^④随之大石又令将士们抢先渡河，分左右翼包围宋军，大败之。杨可世“中铁蒺藜”^⑤，“箭及骨，血流满靴”，“堕两齿，胸腹中流矢”^⑥。与此同时辛兴宗所率的西路军也败在四军大王萧干的手下。六月三日耶律大石指挥轻骑追袭撤退的宋军，于雄州（今河北省雄县）一带接战，宋军大溃，“死尸相枕，不可胜计”^⑦。于是，种师道“坐免官”^⑧。

六月六日，耶律大石接见宋使马括，责之：“南北通好百年，何为举兵侵略土地？”在马括以“宋不取怕金来取”作答辩之后，大石怒责道：西夏过去“多次上表，欲兴兵夹攻南朝（指宋），本朝每将表章封与南朝，不肯见利忘义，听用间谍。贵朝才得女真一言，即便举兵？！”此语可谓义正词严。然后，大石又以雄傲的姿态说道：“以两国和好，不欲留使人，食罢可行。”并传语童贯：“欲和则仍旧和，不欲和请出兵见阵！大暑热，毋令诸军从苦。”^⑨从这一段出